



左图：2021年9月29日，联合国难民署宣布，29岁的萨利玛·雷曼医生成为今年南森难民奖亚洲区域获奖者。从阿富汗难民到服务巴基斯坦社区，雷曼医生的事迹对后来者应有启发。

图片提供 / 联合国难民署

国家出现了“辞职潮”，劳动者要么选择提前退休，要么因担心感染新冠而不愿恢复工作。英国因为脱欧又流失了一大批欧盟劳动者，脱欧和疫情双重冲击使英国劳动力短缺格外严重。在欧陆，德国享誉世界的职业教育系统因劳动力短缺受到严重冲击，疫情期间可谓“完全崩溃”，学徒培训合同签订的数量已经降至两德统一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德国联邦劳动局局长德特勒夫·舍勒表示，德国可能需要每年引进40万移民来解决高技术劳动力短缺问题。德特勒夫·舍勒的话实际上已经表明：欧洲不是不需要劳力，而是需要高技术高素质的劳力。

2020年3月，《专业人才移民法》在德国生效。《德国发展报告(2020)》指出，《专业人才移民法》与之前的移民和难民相关法律体系相比，很多内容都发生了变化，包括开放劳动力市场；提供6个月实习机会，优化求职程序；简化资质认证程序和签证申请程序；为专业人才提供更好的未来发展空间等。有专业人士认为，该法案的出台释放出两个

信号：一是德国正在管理和规范移民；二是德国需要更多的移民。

德国的做法也许也正是欧洲国家一致的想法，即通过对高技术人才敞开大门来提升本国经济实力，而不是简单地接收低层次的难民劳力。虽然这一法案确实有望缩小德国就业人数的缺口，但也引发了不少批评和反对声，无论如何身无一技之长的难民的命运，真的很难再让欧洲动容了。

多种不稳定因素交织

新冠疫情的不断反复，让欧洲经济走出衰退低谷再添变数。而六年来尚未妥善解决的难民问题也导致各国因抗疫和复苏经济而高企的财政赤字雪上加霜，识别、管控、登记、分流难民也将给相应国家的公共卫生等部门增大工作强度和防疫难度。

不论是实力强大的德国和法国，还是稍显落后的克罗地亚和马耳他，抑或是南部边境的意大利和希腊，

都为难民忙得焦头烂额，而且由此产生的社会安全问题也日渐严重。

欧盟的难民政策主要以防止非法入境和强制驱逐为主。最近几年，寻求避难的难民已经从一个人道主义关怀的问题变成了欧美内部的安全威胁，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2021年5月，一项由伊福普调查公司(IFOP)展开的调查显示，71%的法国人认为难民已足够多了，不想再看到更多难民；64%的法国人表示，为预防境内受恐怖主义威胁，法国不应再接收难民。近年来，法国经济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恐怖袭击频发，该国2021年的预算赤字高达2200亿欧元。多重因素交织下，法国早已不堪重负。不只法国，意大利、德国、希腊等欧洲国家在难民安置工作上也包袱沉重。

早在疫情暴发前，欧洲各国在难民的住房问题上就已力不从心，多个难民营人满为患，眼下正值疫情蔓延，疫情防控对居住空间的要求更高、解决难度更大，欧洲面临难民安置压力有增无减。一旦这些难民看到了欧洲价值观只能停留在宣传和口头上，无法真正救他们于水火，这种反差带来的失望可能使其对欧洲价值观质疑，一些人很容易就走上极端的道路，很有可能成为欧洲恐怖主义滋生的新的温床。

在这种情绪包围下，再加上难民素质良莠不齐，各种犯罪活动增加，欧洲国家居民对于难民的态度更加难以乐观，这也增加了难民在当地找到工作、融入欧洲社会的难度。难民们要渴望在欧洲国家落脚，重建新生活，安居乐业，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